論　著

「烈士向警予」：中共對五四激進女性的革命書寫與塑造*

柯　惠　鈴**

摘　要

向警予應該算得上是中共革命史上最著名的女黨員之一，她生於 1895 年，死於 1928 年。時當所謂「大革命」破滅，共產黨四分五裂，因「叛徒」告密，向警予遭逮捕並被武漢地方軍事實力派胡宗鐸所殺。向警予於 1922 年

* 本文係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 2018 年 6 月 19-20 日召開「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國際學術討論會所發表的論文修訂、增補而成，感謝研討會論文評論人張小虹教授、陳相因教授提供的意見。同時，對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的修改建議，也深致謝忱。

**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入黨，時年 27 歲，死的那年 33 歲，她的黨齡只有 6 年。1928 年向警予為革命「犧牲」後，中共開始書寫有關她的生平。1928 年，蔡和森首先提筆書寫這位革命女同志兼愛人的生平。1939 年，毛澤東在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上，提出以向警予作為動員邊區婦女勞動的模範。1958 年，在中共積極展開三面紅旗大躍進之時，婦聯更發動廣泛的紀念向警予活動並為之鳴鑼敲鼓。接著，1978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垮台，中共黨中央再次大規模紀念向警予。1990 年，向警予的紀念書寫交付湖南省區黨的機構負責。2015 年，向警予誕辰 120 周年時，又有湖南省期刊出版向警予紀念專刊。本文從革命書寫與烈士塑造的角度，解讀「女烈士向警予」面目的變換，透過分析不同階段的革命書寫文本，凸顯向警予生平被表揚的重點如何挪移。此一文本分析當有助吾人了解「烈士」書寫，在中共黨中央是如何發揮宣傳作用。

關鍵詞：向警予、五四、婦女、革命烈士、歷史書寫

一、前　言

向警予應該算得上是中共革命史上最著名的女黨員之一，她生於 1895 年，是清廷甲午戰爭敗給日本，簽了喪權辱國馬關條約的一年。死於 1928 年，時當所謂「大革命」破滅，[1] 共產黨四分五裂，因「叛徒」告密，向警予遭逮捕

1 「大革命」是中共用詞，意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革命鬥爭」，時間是 1924 至 1927 年，即國民黨方面所說之國民革命北伐時期。參見

並被武漢地方軍事實力派胡宗鐸所殺。[2] 比對目前各方披露的向警予生平資料，她是 1922 年入黨，時年 27 歲，死的那年 33 歲，黨齡只有 6 年。中共女黨員當中，和向警予差不多同時期入黨者，有蔡暢、鄧穎超二人。蔡、鄧堪稱女黨員中的元老，黨齡長且資歷完整，她們都與 1919 年五四運動及同一時期的激進思想有密切關係。1920 年代她們活躍於共產黨內，歷經 1920 年代至 30 年代中共從城市轉入鄉村，與二萬五千里「長征」。延安時期同樣見到她們的身影，到 1949 年中共建政，並且自 1950 年後，開展一連串社會主義建設，她們無役不與。[3] 不過，從蔡暢、鄧穎超兩人後來的經歷來

金冲及，〈從迅猛興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的前前後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3-22。

2 1927 年 7 月，武漢政權宣佈「分共」，國民黨軍隊強力反撲，搜捕共黨組織及黨員。兩湖地區（包括武漢），許多共產黨員被捕後，「背叛同志」乃至「出賣同志」真實身分及工作機關地點，向警予即是被中共「叛黨」的地下交通員所指認。戴緒恭，《向警予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 151-154。

3 蔡暢生於 1900 年，1915 年入長沙周南女中，1919 年和向警予、哥哥蔡和森、母親葛健豪一同赴法勤工儉學。1923 年加入共產黨，同年和李富春結婚。1925 年從莫斯科回國後，任中共兩廣區委婦委副書記。1934 年 10 月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1945 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1948 年，當選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1949 年當選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婦聯）主席。1990 年，以 90 歲高齡過世。鄧穎超生於 1904 年，本名鄧文淑，後考入直隸女子第一師範學校，改名鄧穎超。五四運動時，和郭隆真、張若名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隨後加入周恩來等人發起的「覺悟社」。1923 年和覺悟社女社員李峙山組織「女星社」，翌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 年轉為正式黨員，與周恩來在廣州結婚。1927 年後，一度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和周恩來在上海工作。1928 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隨周恩來進入瑞金，

看，似乎中共認定這二位從五四運動中蛻變爲激進女性的前輩黨員，最適任的職務是攸關婦女、兒童的動員或福利工作。在政府部門或黨中央，她們幾乎沒有舞台。蔡、鄧兩人的職務安排，透露婦女、兒童工作似乎不是中共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迫切要項。但爲了拉攏婦女，由那些具有聲望的前輩女黨員領銜負責，至少能夠提高該負責工作部門的能見度。蔡、鄧的經歷說明，婦女黨員與婦女工作在中共黨中的地位，作爲中共開明改革的門面，是不可或缺的；實則中共黨中央瀰漫濃厚的家父長作風，婦女幹部及婦女工作只是黨各項社會改革中邊緣的一環。

中共黨中央對婦女幹部與婦女工作表面重視、實質邊緣的作法，早在 1920 年代就已十分顯著。作爲中共最早的婦女工作理論家及領導人，向警予生前屢屢對中共以解放婦女作號召，黨文化中卻難脫尊男卑女的氣息，深感挫折。[4] 向警予一直都明白，女黨員在中共黨內地位、權力不能和男黨員相提並論。1928 年向警予爲革命「犧牲」後，中共開始書寫有關她的生平，同年，向警予的配偶蔡和森首先提筆書寫

淡出領導層。1934 年，抱病參加「長征」。抗戰爆發後，鄧穎超隨周恩來在重慶工作，主要動員大後方婦女。1945 年，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出任中央婦委副書記。1946 年，當選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理事。1949 年後，鄧穎超連續擔任婦聯一至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名譽副主席，其間並任職於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鄧穎超自中共八大後，一直是中央委員，始終沒有擔任政府要職。蘇平，《蔡暢傳》（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編，《鄧穎超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

4 向警予，〈中國婦女宣傳運動的新紀元〉，原載《婦女日報》，1924 年 1 月 2 日。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 115-117。

這位革命女同志兼愛人的生平。[5] 1939 年，毛澤東在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上提出，以向警予作爲動員邊區婦女勞動的模範。[6] 1958 年，在中共積極展開三面紅旗大躍進之時，婦聯更發動廣泛的紀念向警予活動並爲之鳴鑼敲鼓。接著，1978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垮台，中共黨中央再次大規模紀念向警予。1990 年，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將近十年後，向警予的紀念書寫交付湖南省區黨的機構負責，顯示她由全國性

---

5 關於向警予研究，中共出版的紀念集及文集，按年代前後比對，對她的描述有「層疊」現象，也就是重覆與重塑交錯。細較全部文本後，關於向警予的生平，有些說法是「十分」可靠的，特別是當時報紙報導的「事件」。在 2011 年向警予私密的資料公布前，對向警予的研究多從「政治」出發，以致具有深厚「黨化」色彩。迄今為止，黨公布的向警予資料牽引著研究進行的方向及程度，極為顯著。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向警予的著作及資料，除去西方外，最具代表性且其論述貼近中共黨的「革命史觀」者，當屬戴緒恭所寫的《向警予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按筆者目前所排列的向警予文集，有以下幾種，不同年代「生產」，頗能顯示中共黨史與政治動員如何結合「烈士書寫」。例如，中國婦女雜誌社編，《烈士向警予》（北京：中國婦女雜誌社，1958）。《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長沙：新華書店，1985）。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本文最後要加入一本 2011 年出版之《向警予文集》的討論，因這本文集公布較多向警予私人資料，其脈絡既在前面政治主導的烈士書寫脈絡中，又顯出稍稍「解禁」的意味，對重啟向警予研究饒富意義。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 1939 年延安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上，毛澤東發表的講話中說到：「我們要學習大革命時代犧牲了的模範婦女領袖，女共產黨員向警予，她為婦女解放，為勞動大眾解放，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毛的講話，並未深入向警予生平細節，況且 1924 年，廣州婦女首度慶祝三八婦女節，向警予與這個跨國性的婦女節日關係不深。毛澤東儘管提到向警予，卻是「平鋪直述」，宣傳作用不顯著。毛澤東，〈偉大的「三八」節日在延安〉，《延安日報》（延安），1939 年 3 月 30 日。

的革命女先烈變成地區性湖南革命先烈典範。向警予的時代新面目儘管變動不大，但已預告其歷史地位不再是由中央定調。時間往後走 20 年，2011 年向警予的私人文字紀錄終於公布，這些資料包括長久以來都未爲研究者所得閱的作文、日記、文稿、書信等，通通曝光，[7] 資料與烈士研究形成辯證關係。往前推至 2005 年時，西方學界曾欣喜這位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女黨員可以被重新評價，可惜卻未有更多的向警予研究成形。而 2011 年的新史料，在 2015 年向警予誕辰 120 周年時，提供了重新詮釋向警予的重要憑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新研究對向警予做爲「女性」的部分說法，得以突破先前「革命烈士」的書寫方式。[8]

2011 年以前，各種向警予文集出版，其蒐羅範圍實限於 1920 年代報刊已有的向警予文字及其交往圈中人物的諸多回憶與記憶。而向警予個人較私密的文字紀錄，既不可能見於報刊，亦受限檔案館的公開尺度，以致對向警予書寫，始終籠罩在中共黨史及政治動員的既定框架。從資料公布程度到論述內容與角度，無一不摻雜黨的聲音。1981 年，戴緒恭的《向警予傳》，是截至當時爲止，對向警予個人描寫最完整的歷史著作。關於向警予從女學生、女教師、女校長到留法社會主義信仰者、再成爲共產黨主獻身者，懷抱革命理想、不存一己之私、不顧一己之身、不念一家之情，最終「英勇就義」的短暫生平，戴緒恭的筆法貫澈始終，把向警予牢牢釘在中共革命史慷慨就義的先驅行列中。其後，由於私人

---

7 參見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

8 參見《湘潮》2015 年 10 月份當期，該期為「紀念向警予誕辰 120 周年」專號，收錄文章數目頗多，題目亦較過去研究多元。

資料始終付之闕如，以致向警予的革命烈士愈來愈不具女性意味。又因她死得堅決壯烈，毫無疑問地成爲中共革命書寫的典型人物。[9] 她的所作所爲，被填塞了各種意義。這些意義的發揮，與其說是張揚傳主本人的事功，更多是在闡述各

---

[9] 在近代中國女烈士系譜中，向警予的生平與作為，使其完全無法跨出「共產黨」黨史、革命史生產的範疇。而早於向警予在辛亥革命中殉義的秋瑾，則因生處清末民初時期，儘管她是光復會會員，也算是同盟會分支，屬於「國民黨」的前身，唯因彼時共產黨尚未誕生，秋瑾後來亦可跨越黨派藩籬，成為共產黨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參與革命，乃至婦運源遠流長的重要源頭。秋瑾的研究恰足與向警予研究構成對話（對照）關係，目前的秋瑾研究，以胡纓(Ying Hu)所寫的〈九葬秋瑾——歷史紀念與公共記憶的製造〉一文，與本論文所討論的方式較接近。在過去資料累積及研究基礎上，胡纓以記憶、想像與遺忘種種層次，耙梳「秋瑾」死後的歷史位置挪移。她亦注意到物質文本（如建築），而非只有文字文本，是很具啟發性的研究角度，惟她的研究不談國民黨對秋瑾這位革命女先烈的謳歌與塑造。秋瑾在國民黨中的歷史地位詮釋，關乎辛亥革命由誰領導。爾後國民黨重視女權、提高婦女地位，得婦女擁護，也都少不了運用「秋瑾」來進行論述，秋瑾甚至亦成為「青年楷模」。這些紀念論述與胡纓提到的中共秋瑾紀念，可做對比。參見胡纓著，龍瑜宬譯，〈九葬秋瑾——歷史紀念與公共記憶的製造〉，收入鄧小南、王政、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243-286。抗戰末期，重慶出版了一套「青年模範叢書」，該書編輯旨趣提到青年每當國家危難，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行為，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為鼓舞青年見賢思齊，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故而有此叢書之編輯。該套叢書第二輯列出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者，有陸皓東、史堅如、鄒容、秋瑾、黃克強、陳英士、朱執信、廖仲愷、蔡松坡、黃花崗烈士。秋瑾部分，書寫簡明，注重其愛國「情感」萌芽與驅使。羅時暘編著，《秋瑾》（重慶：青年出版社，1945 年 5 月）。此外，國民黨的黨史文獻資料中亦不乏秋瑾專篇、專章。例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秋瑾烈士為國殉難文檔〉，《革命文獻》（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集 1；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秋瑾〉，《革命人物誌》（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集 3。

個「革命建國」階段的意義，爲中共黨中央教育廣大黨員與民眾，樹立跨時代的標竿。

本文從革命書寫與烈士塑造的角度來解讀「女烈士向警予」面目的變換，目的不在釐清向警予生平各式各樣的細節，而是透過不同階段的革命書寫文本，凸顯向警予生平被表揚的重點如何挪移。此一文本分析當有助吾人了解「烈士」書寫，在中共黨中央是如何發揮宣傳作用。同時，討論「革命歷史」如何藉著烈士事蹟逐步定調。這一研究也有助於史家進一步思考，作爲歷史研究文本的「烈士書寫」，應該如何解讀與運用。本文從向警予的個案研究出發，要釐清的是中共「女」烈士、「女」同志，不論是個別乃至集體，到底怎樣可以找到「她」及「她們」的聲音？最終更想解開的是，歷史研究如何解構女烈士書寫，女性的私人紀錄如何突破政治書寫的禁忌？當政治圈禁一旦鬆綁，是否便意味「女烈士」研究會隨政治重要性流失而失去歷史研究的立足之地？

關於中共「烈士向警予」的建構，儘管 1928 年就已開始此一書寫工程，卻是零星且流通不廣。直至 1980 年代，向警予個人的婦運言論，以及同志、家人在向警予死後的回憶文字才集結成冊。除了向警予的言論外，回憶文字自然不能排除是政治動員的結果。伴隨這些「整理」過的史料，1981 年戴緒恭完成《向警予傳》，該書除了運用已出版的資料外，顯然還看到當時尚未開放的向警予私人史料。這又說明了所謂的烈士書寫，與政治之間緊密結合。故本文探索「向警予烈士」政治塑造的過程，便以戴書爲起點，由後往前追溯、推衍，藉以揭開「女烈士」書寫與中共政治宣傳、群眾動員間千絲萬縷的關係。

二、《向警予傳》：「共產主義獻身者」的裂縫

向警予生於 1895 年 9 月 4 日，其成長的年代，伴隨的是中國內外危機深重、政治動盪與社會擾嚷。向警予本人及其家庭成員往後的遭遇，都緊扣住時代脈動，濃縮了近代中國從清末至 1920 年代大約 30 多年的歷史變動軌跡。1928 年 5 月向警予因國共分裂遭處決，是年 12 月，國民革命在東北張學良易幟後宣告完成北伐，國民政府聲稱統一中國，前一年已於南京奠都。[10] 實則，從 1927 年年初始，國、共兩黨原先建立的合作關係已漸見矛盾，[11] 到 1927 年 4 月國民黨右派掌握上海、南京，一場對左派及共產黨人的清黨行動就此展開。左派及共產黨人控制下的武漢及兩湖地區，與長江下游右派掌控形成對峙，打著無產階級革命的群眾運動迅速蔓延，工會、農會爲工人、農民撐腰，分田、罷工、侵吞資本、霸佔商店等過激行動時有所聞，商人、資本家、地主、豪紳乃至大小軍閥通通成了受害者，他們集結起來呼應國民黨右派的清黨。到 1927 年 7 月，隨著武漢政局的混亂，左派內部矛盾叢生，握有軍事實權者便展開解散農會、工會，捕殺共產黨員的行動。其後，共產黨組織在城市中基本

10　1927 年 4 月 17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 73、74 次會議，宣佈定都「南京」。侯鳳雲，《傳統、機遇與變遷——南京城市現代化研究(1912-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 108。

11　1927 年 3 月，上海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蔡元培、張人傑、李煜瀛提出「護黨救國案」，4 月 2 日議決清除黨內中共分子，「清黨」行動於焉開始。武漢左派攻權亦在軍人不滿，以及共黨工農運動過激情況下，於 7 月「分共」，國共全面決裂。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頁 573-581。

上無法立足，黨員紛紛轉入地下，而後中共發動幾次暴動，陸續以失敗收場，共產黨勢力極速衰微。這段歷史是共產黨建黨歷史中企圖以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初期，男女黨員洋溢理想、熱情，同時又不免激進、幼稚與空想。此一時期，許多共產黨員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接受新思潮的洗禮，踏出反傳統、反封建的第一步，從而受俄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學說的影響，自此皈依共產主義。早期共產黨員由知識分子轉變爲職業革命家者，他們並非以階級鬥爭意識型態掛帥。相反地，許多人的思想與行動都相當駁雜，從較溫和的教育立國到激進的革命改革，可謂異彩紛呈融於一身，向警予就是一顯例。惟 1928 年後，國共爭權已到你死我活程度，其後，中共歷經「艱苦革命道路」，終於取得國家統治權。建黨初期的歷史，便成爲後來中共政權立足的根基始源。早期共產黨員的面目在意識型態主導下，漸淪爲一元框架書寫，其脈絡與黨史書寫往往同調，革命先驅的評價由黨定調，因檔案資料影響歷史研究去向。1920 年代活躍的共產黨人，其生平研究材料較可靠者多數來自報刊，至於黨組織及個人資料多半付之闕如。只能等黨的政策變動、資料開放，革命人物的整體樣貌，才得略微明晰。向警予的研究便是在黨控制下，一個具代表性中共「革命人物」歷史書寫的樣版。

1981 年，戴緒恭出版《向警予傳》一書，時間正是告別文革，中共改革開放起步時期，戴在完成《向警予傳》後，與姚維斗合編《向警予文集》，該書於 1985 年出版。細心追索 1980 年代初期出版的《向警予傳》及《向警予文集》，可以發現有幾處研究罅隙。首先，向警予個人所寫、較易流露作者本人情感、觀點與抉擇的文本，從未收入 1980 年代

及之前的任何《向警予文集》，例如日記、書信等，顯然這些材料較具突破政治解釋及說法的可能。再者，文集收錄比例相當大的，來自向警予同時代共同參與革命的存活者對她的說法、看法，還有一大部分收的是向警予家庭成員後輩回憶性質的文字。後兩類文字集結塑造的向警予，其精神世界與外表形象，格外的統一，結論都指向她是一位「革命典範」。戴緒恭的書寫可謂爲向警予定調的典型，全書看不到對向警予的批判、指摘，也迴避向警予與中共黨中央關係的變化，尤其是向警予個人際遇的起伏，背後的歷史細節更是模糊帶過，明顯如她在中共第二、三、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推選爲中央委員，而於 1927 年 4 月召開的五大卻被拔掉這一職位，此一算得上是明顯的個人黨權跌落，未作出解釋或交待。

事實上，向警予個人參與共產黨革命事業的高峰時期，是 1923 年 6 月，中共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正式宣布國共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而向警予所提之〈婦女運動決議案〉在大會中通過，成爲指導中共婦運的最高政策方針。其主要內容是婦女運動要納入「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兩個口號，也就是要動員婦女群眾加入國民革命行列。其次，向警予亦認定階級觀點對婦女運動是必要的，卻不可太急躁。[12] 1924 年 1 月國民黨在廣州宣佈改組，國共合作下的婦女運動在上海如火如荼展開，向警予既是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實際上又掌握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許多工作，[13] 自此她成爲中共

12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84。

13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1919-

革命婦運的掌舵者，地位非其他女黨員能及。[14]

1923 年後，領導、團結、策動工人罷工，成為共產黨黨中央主要的革命群眾運動路線。當時向警予在上海，亦深入上海女工，支援、組織與宣傳女工爭取改善工作待遇的罷工行動。上海絲廠女工的人數最多，工作環境及工作條件卻極惡劣，女工屢屢為爭取自身權益，與廠主、資方發生衝突，進而上升為罷工的事件。[15] 向警予認為女工是所有婦女群體中，最為團結、最具階級覺醒、最能堅持拚鬥、最具共同目標的「受壓迫者」。因此，她投入女工運動，訓練女學生打入女工陣營，進行宣傳、組織，企圖使女工成為國民革命群眾婦運動的主體。這個努力至 1925 年五卅運動爆發後，在工人反軍閥、反帝國主義抗爭流血事件中，達到高潮。

1925 年，上海工人運動聲勢達到頂峰。在上海婦女運動，尤其是女工運動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領導者向警予，理應成為革命工人運動者的要角，卻於 1925 年 10 月受黨中央指派，與她的丈夫蔡和森還有部分黨員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學習」。關於向警予卸下婦女運動領導者職務，離開革命事業熱火朝天的上海，前往人生地不熟的俄國，戴緒恭並

1949)》（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頁 59。

14 當時在上海活躍的年輕女共產黨員如楊之華、王一知、張琴秋、鍾復光等都視向警予為「老大姐」，向警予的婦運領導地位無人可及，諸女黨員的回憶披露甚多，參見楊之華，〈悼向警予同志〉；王一知，〈紀念向警予同志〉；張琴秋，〈當我第一次深入工人中的時候〉；鍾復光，〈婦女運動的傑出領袖〉。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頁 172-173；250-257；258-259；262-270。

15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臺北：商務印書館，2018），頁 69-102。

未交待其間的轉折為何。而當向警予結束莫斯科的學習，於1927年4月回到武漢，她與丈夫蔡和森各處一方，蔡和森回國後繼續任中共黨中央委員，對於黨的重大決策仍具決定權，[16] 反觀向警予獨自一人抵達廣州時，先住鄧穎超處，後往武漢接任新工作，途中轉回長沙，以前兒媳身分探望蔡和森母親葛健豪及全家老小，這不像「團圓」反像「訣別」，更映照向警予的失意、落寞。她到武漢後，先是在漢口市委宣傳部擔任部長，後因情勢危急，黨員四散，黨中央遷往上海，她留在湖北省委繼續進行工人動員工作。此時，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於武漢召開「八七會議」，清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取而代之是瞿秋白的「土地革命與反國民黨總方針」，[17] 中共生死交關的重要關鍵性大會，向警予卻沒有資格參與，她是從其他黨員同志口中知道八七會議決議的新方針。[18] 1927年11年，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瞿秋白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確立，方向是「不斷革命論」，發動工農革命推翻軍閥豪紳的鬥爭方式在毫無前途的情況繼續堅持。此時的武漢，大批黨員退黨，共產黨員被殺害、關押，人數從最多時的8千多人，萎縮到只剩3、4百人，同時有組織的工人從原來的30多萬，減至1千多人，[19]

---

16 1927年3月蔡和森由莫斯科回中國，他出席五大，當選中共中央常委，並一度代理黨中央秘書長的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黨史研究室編，《中國人民永遠記著他——蔡和森110周年誕辰紀念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393-394。

17 郭華倫，《中共黨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1982），冊1，頁282-293。

18 八七會議前後，羅亦農是湖北省委書記，據聞是他於一個飯局上，告訴向警予關於八七會議的「精神」。戴緒恭，《向警予傳》，頁138。

19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142。

就連長江局書記兼湖北省委書記的羅亦農亦因與中央意見相左，而被調離。向警予在湖北風聲鶴唳情況下，堅持在工人中繼續進行秘密工作，其情其景可謂慘然！向警予可說是在幾乎無援的情況下，於武漢隱蔽自己，幾乎已脫離婦女工作。究竟在向警予生命的倒數階段，她對革命情勢的惡化與自己何去何從，有無文字可以直接理解，而非旁人轉述與觀察？這樣的疑問，至少在 2005 年堪稱蒐羅了最完整向警予研究資料的《向警予紀念文集》出版時，仍無法解答。2011 年，戴緒恭、姚維斗兩人掛名編輯的《向警予文集》問世，這本顯然是 1985 年戴、姚兩人合編文集的「增訂版」。書中公布過去未曾披露的向警予資料，包括 1926 年後的四篇與政治相關的言論、向警予 1915 年的作文、日記，1916 年至 1918 年的文稿，1919 年至 1923 年的家書。[20] 這些資料使向警予「共產主義獻身者」的完整面貌中，開始滲入許多濃淡深淺不一的普通人色彩。較屬私人性質的文字書寫中，尤其突出的是她的女性身分的眞情書寫。這些文字對黨所塑造的向警予革命烈士完美形象，未必能完全動搖，卻能對後來中共如何啓動塑造向警予烈士工程有更明確的掌握。尤其是政治表態性質的文字，更足以揭露戴緒恭的向警予「烈士典範」書寫中所遮掩的部分。

2011 年新公布的向警予資料，其中有 4 篇是她 1926 年

20 向警予家書面世者僅有十封，多是寫給父母、兄嫂、姪女等，缺乏寫給黨同志及丈夫，是未曾寫過或是尚未公布，無法解答。而就目前十封家書內來看，向警予流露對父母的依戀，對兄嫂的關懷，對子姪教養的重視，與「革命祖母」古板嚴肅形象，不盡相同。參見黃卓群、何先培，〈真情透紙背——品讀向警予家書十封〉，《湘潮》，期 10（2015 年 10 月），頁 106-108。

後的政論文字。第一篇是 1926 年 3 月 13 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擴大會議開會時，向警予在大會中的簡短講話。在這篇談話中，向警予代表中國女工向俄國伏羅涅史州工農婦女表示感謝。她說中國工農婦女受到三重壓迫，即軍閥、帝國主義以及家庭、社會的封建殘餘，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女工將加入中國無產階級的行列，消滅外國和中國劊子手的壓迫和剝削」、「蘇聯工農勞動婦女的光輝鬥爭是我們的榜樣，它鼓舞我們奮鬥」。[21] 這樣的文字難以讀出她個人的見解與觀點，而壓抑的口吻與 1920 年代初期談婦運的鏗鏘見解，形成強烈對照，這時的向警予似乎噤聲了。另外一份公開文字紀錄是 1927 年 11 月 27 日，向警予在湖北省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提出三點建議，其一是黨應設置通訊社，總社可設上海，地方上辦有工人報之地區，應成立分社，負責搜集國際及國內工農革命的狀況及敵人情況，並可傳訊息於當地，會較黨內報告直接而迅速。其二，中共中央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只設工委，爲何不設農委？其三，關於內部教育同志之大綱。[22] 這份發言，從另一個角度證明向警予已遠離中共中央的權力決策圈。她在省委提出的問題，其實已上升到中共中央權力重組問題。取消農委，使原在農民運動中具有舉足輕動的中共中央黨員形同削權。向警予明知而故問，抑或不知而明問？這些疑惑是現有資料無法解答，而她不在中共中央權力核心確屬事實。第三

21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擴大會議上接受獻旗時的講話〉（1926 年 3 月 13 日），收入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頁 215。

22 〈在湖北省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27 年 11 月 27 日），收入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頁 256。

篇是向警予接手湖北省委宣傳刊物《大江》時，於 1928 年 2 月 7 日所發表的復刊宣言，距離 1923 年中共領導鐵路罷工的「二七」事件恰好 5 年。在宣言中，向警予鼓舞已氣息奄奄的中國共產黨同志，說要「踏著『二七』烈士」的血跡前進！前進！努力殺敵！《大江》願做你們的小小助手！」。[23] 宣言發表時，武漢風聲正一天緊似一天，許多共黨機關被破獲。向警予工作的地點不斷轉換，據言她改用各種化名，最終還是於 3 月 20 日在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當時向警予身邊還有一位年輕女黨員陳桓喬。[24] 向警予與親人早已疏隔，而曾經是丈夫又身兼中共中央委員的蔡和森，當時正被指派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25] 兩人曾有的「向蔡同盟」，被毛澤東稱讚爲衝破舊婚姻制度，樹立大家榜樣的自由結合，已渺無踪影。

關於向警予何時與蔡和森認識，戴緒恭推測時間是 1914 年後。即向警予由常德女子師範轉到長沙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後再於秋天入私立周南女校這段時期。因爲蔡和森的妹妹蔡暢當時亦是周南女校學生，向警予與蔡暢認識，故而得以拜訪蔡家，得識蔡和森。[26] 1918 年 6 月，蔡和森在新民學會會員推舉下，前往北京聯繫留法勤工儉學問題。秋

---

23 〈《大江》復活與紀念「二七」〉（1928 年 2 月 7 日），收入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頁 257-258。

24 陳桓喬，〈我和向警予大姐相處的日子〉，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頁 301-319。

25 1928 年 3 月中旬，蔡和森被指派為中共代表，參加六全大會。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黨史研究室編，《中國人民永遠記著他——蔡和森 110 周年誕辰紀念集》，頁 398。

26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36。

天，向警予亦有意找機會對外擴展，前往北京，試圖和蔡元培等聯繫。[27] 據聞，蔡和森和向警予兩人在北京有過短時間的接觸。隔年 1919 年秋天，向警予正式加入新民學會。在蔡和森的提議下，向警予和蔡暢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28] 後向警予決意辭去原任溆浦女校校長職，赴法留學。1919 年 12 月 25 日，向警予與蔡和森母親葛健豪、蔡暢、蔡和森等一行共 30 多人，從上海乘法國郵船出發，遠渡重洋，展開勤工儉學新生活。航程中，蔡和森以其在北京近一年所接觸的社會主義學說、理論，全般與向警予一起討論分享。兩人因志同道合，萌生愛情，據聞合寫了一首詩，題名爲〈向上同盟〉。[29] 抵達巴黎後，向警予入蒙達尼女子公學，爲克服語言障礙，她每天苦練法文，一邊學習，一邊做工。同時，也致力鑽研艱澀難解的馬克思主義等著作。

1920 年 5 月，蔡和森、向警予於蒙達尼結婚。他們的婚姻完全立基於自由戀愛基礎上，對於致力追求改變自身亦同時改造社會的左派共產黨青年而言，實富進步意義。婚後，向警予寫信給在周南同校時的至交陶毅及任培道，稱：「妹與蔡君已有戀愛結合」，[30] 而蔡和森也寫信告訴毛澤東：「我

---

27 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頁 319。

28 1919 年 12 月 3 日成立，見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頁 320。

29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48。

30 按戴緒恭的書，向警予於 1920 年 6 月 7 日給陶毅、任培道的信中，主動表明她與蔡和森已「戀愛結合」。目前公布的原信，卻沒有這樣一句話，是否引證有誤或信件刪節，實無從了解。參見〈給陶毅、任培道〉，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頁 38-39。參見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51。

與警予有一種戀愛上的結合」。[31] 其後兩人在巴黎攜手爲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爭取學習權、工作權，同時又是共產主義醞釀成立旅歐支部的先行者。[32] 1921 年 11 月，蔡和森因帶頭發動占據里昂大學事件被法方驅逐出境，於 11 月 23 日返回上海；向警予隔年年初亦離法返國，回到上海後即加入共產黨。1922 年 4 月，向警予在上海生下女兒蔡妮；7 月，蔡、向同時出席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中央委員。1924 年，向警予在長沙生下次子蔡博，次子連同長女都交由蔡和森長姐蔡慶熙哺養，[33] 向警予則全力投入黨的婦女工作。

1923 年 6 月，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到上海黨中央機關工作，地點是閘北區三曾里。此處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蔡、毛、羅三家住所。毛住樓下前廂房，蔡、向住後廂房，羅住樓上，後楊開慧從湖南來，與毛澤東共居於此。後來，羅章龍離上海，毛澤東、蔡和森搬到慕爾鳴路甲秀里，仍共居一屋。[34] 中共這種結合機關辦公與私人住所於一地的作法，竟牽扯製造了蔡、向婚姻中的紛擾。[35] 向警予自認識蔡和森後，在思想上接受了這

---

31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51。

32 關於蔡和森和向警予在法國的活動，參見羅紹志、李沛誠、何鵠志、寧丹陽合編，〈蔡和森傳〉，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黨史研究室編，《中國人民永遠記著他——蔡和森 110 周年誕辰紀念集》，頁 331-372。

33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173。

34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106-107。

35 五卅前後，蔡和森北上北京養病，向警予留在上海參加政治運動。當時向警予跟隨同志遷到福生路的居所，同住有沈澤民及沈澤民太太張琴秋，以及鄭超麟、張伯簡等人，還有病癒出院的彭述之。按照鄭超麟的說法，1925 年中秋節當日，同居一處的同志共聚並有慶祝節目。

位「愛人」的引導，尤其在法國時，她的思想眼界日漸共產主義化。1920 年 6 月 2 日，向警予寫了一封信給在國內的毛澤東及彭璜，她說：「自出溦以來，覺從前種種，皆是錯誤，皆是罪惡，此後駕飛艇以追之，猶恐不及。而精力有限，不足以饜予以所欲，奈何？計惟努力求之耳！數年後，或有以報同志」。[36] 這位意欲「駕飛艇以追之」的有志女青年，回到中國後，果然劍及履及，從 1922 年年初加入共產黨，執筆爲文、領導婦運、組織女工、聯絡婦團、抨擊時政。[37] 旁

結束後，住 3 樓的向警予一直留在樓下彭述之房間徹夜長談，彭述之後來說，向警予說出「她愛他」。不久，蔡和森即從北京回到上海。素有馬克思主義「宋學家」評價的向警予，藏不住心事，她和彭述之事很快就被知悉。幾日後，中央主席團在福生路此處開會，會議將散時，蔡和森把向警予和彭述之問題提出，請大家討論。列席會議者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等無不驚愕萬分，陳獨秀問向警予究竟愛誰，向警予伏案大哭，不置可否。中央主席團負起解決責任，最後決定向警予和蔡和森一道去莫斯科，向警予未抗議，事情落幕。會後，向警予斥責蔡和森自私自利，明知中央會站在蔡一邊。向警予和蔡和森在陳獨秀指示下，搬離同志共同居處，住進旅館。彭述之長吁短嘆，事情未了結。向警予與蔡和森到莫斯科後，終究分手。而蔡和森、彭述之結下很深心結，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蔡和森拚命打擊彭述之，後來蔡和森主持北方局，權力在時任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之上，指控彭述之出賣黨內同志，黨內的戀愛風波延燒到政治鬥爭。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3），卷 1，頁 286-289。

36 〈給彭璜毛澤東〉（1920 年 6 月 2 日），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頁 37。

37 向警予於 1923 至 1925 年，近 3 年中，寫了大量的有關婦女運動理論的意見與時評。這些婦運理論，可見其日漸接受以「階級」觀點來進行婦女動員，這又與其擔任中共中央婦女部部長，並兼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運動實際工作有關。以階級觀點進行婦女運動，使向警予努力於使婦運「群眾化」，這包括她對女工運動的重視。同時，也因為

人說她恨死黨內浪漫的男女同志，女同志都害怕她，因為她喜歡規勸人或教訓人，因之還得了「祖母」，也叫「革命祖母」的外號。[38] 但革命真的是向警予的全部感情投注嗎？1925 年，遇到彭述之，向警予的女性意識萌發。只是「女性意識」處於風詭雲譎的政黨權力鬥爭中，是極具威脅性的，向警予本人清楚，黨中央更明瞭。所以，蔡和森、向警予縱然走到破鏡難重圓地步，仍要被迫捆綁一起。其後兩人在莫斯科生活一年多後，結局還是各走各的路。

1927 年回到武漢的向警予，10 月間收到黨內另一女同志謝代茜犧牲前，在獄中托人轉交給她的一封遺書及日記。向警予在讀了謝代茜日記後，寫下一首詩：「雲橫胭脂嶺，波湧白馬濤；千秋知遇在，曠代英風高」。[39] 詩文沒有悲歌，只有視死如歸的英氣，這應該是向警予的心情寫照。1928 年 5 月 1 日，向警予告別革命，走向死亡。向警予無疑死得十分「絕決」，究其生平，除了對彭述之產生感情的一段遭遇外，其餘生命可說是投入近代中國革命史觀不斷重覆提及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軍閥」進程的「完美典範」。因之，關於向警予其人其事，便在其「犧牲」後，

她是中共中央權力核心一份子，使其認定婦女運動必須服從於國民革命，待革命成功之日，婦女地位自然提昇。關於向警予的女權思想，可另闢專門篇章加以梳理，本文實無法通盤深入介紹。相關資料可參見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向警予女權思想研究亦可參見 Christina K.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38 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卷 1，頁 287。

39 〈讀謝代茜烈士日記手稿〉（1927 年 10 月），收入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頁 255。

成爲中共革命歷史最優秀先驅教材之一。她一再被謳歌，並成爲再造共產黨黨魂、黨德的樣板，尤其是二十世紀啓動建構的中共革命歷史，以及中共中央每逢政治動員時，「向警予」就被召喚，賦予其新的時代任務。此項召魂工程最突出的是，1928 年、1958 年以及 1979 年所分別代表的幾個關鍵性政治轉折。

三、1928 年革命之血與〈向警予同志傳〉

1928 年 5 月，向警予死後，人在莫斯科養病的蔡和森，在黨中央的指示下，提筆書寫〈向警予同志傳〉。[40] 既是中央指示，也就意味向警予個人傳記，自始即從屬於黨的論調。蔡和森的向警予傳，距離傳主死亡時間非常近，當時中共革命史書寫尚未建立正統脈絡。不過，爲挽救「大革命」後，黨員意志消沉以及爲弭平你死我活的黨內路線、權力鬥爭，蔡和森藉用「向警予」來鼓舞同志，乃至堅持工人運動奪權方針，用意呼之欲出。彼時，在「右派」、「左派」以及「軍閥」聯手反撲下，黨員動搖、中共中央領導威信低落是政治現實。蔡和森梳理「向警予同志」生前表現，界定向警予是「革命好同志」，顯然是權多於情的衡量。

檢視〈向警予同志傳〉，蔡和森著重描寫的是向警予自命不凡的緣由。包括青少年時期即受其留學日本的大哥向仙

---

40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原件藏中央檔案館。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頁 3-6。

鉞倡導的維新、革命思想影響，說她立志宏偉，[41] 不但是其家鄉漵浦縣最早進入新式學校求學的一批女學生，還常以做「天下第一偉人」的理想自期。[42] 接著，蔡和森又提到 1919 年之前的向警予，萌發的理想是教育救國。1919 年成爲蔡和森定義向警予改變的關鍵年代，因爲那年發生了五四愛國運動。但從向警予個人遭遇來看，早在 1918 年，她就想離開漵浦向外擴展，故有北京之行。這種「歷史重大事件」與「個人經歷」間的角力，正凸顯蔡和森所寫的向警予，有許多「既定」的方向。所以，蔡和森緊扣五四運動，說向警予受此運動影響極大，她當時在鄉村中四處奔走，終日演講，鼓吹愛國精神。蔡和森評論向警予，說她：「不知道別的欲望，唯一的欲望只要她能幹『驚天動地』的事業」。[43]

關於向警予由教育救國轉變爲共產革命信徒，並終生矢志不渝，這個問題關乎革命低潮時，黨員該如何自處，同志間要如何信守忠誠。因之，由中共中央指示蔡和森書寫向警予的傳記論述中，蔡和森的重點擺在向警予對黨的堅貞與視死如歸的意志，源於女黨員受男黨員啓發幫助，這是女黨員

41 向警予原名向俊賢，改名「警予」，深富時代風氣與個人立志雙重意義。1914 年，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朱劍凡，因思想「進步」，被軍閥撤去校長職位。「向俊賢」與部分同學支持朱校長，追隨朱劍凡，轉入朱氏主持的周南女校。由第一女師轉入周南後，「向俊賢」拋掉父母所取蘊含家庭對女兒美好寄望與祝福的「俊賢」，而以自我惕勵不懈不怠的「警予」作為自己的新名字，代表新的自我期許。戴緒恭，《向警予傳》，頁 10。同時代的鄧文淑，後改名「鄧穎超」，蔡暢原名是「蔡咸熙」。五四前後的青年女性，對於原本家庭所賦予的女性傾向濃厚的名字，似乎都感到不適切，為表達新思潮、新自我的「誕生」，替自己取個「陽剛」傾向的名字，不勝枚舉。

42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頁 3。

43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頁 4。

與男黨員「同志」關係的理想方式。故向警予的黨員淬煉歷程，起點是因她參加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成立的新民學會。共產黨員互稱「同志」，這一稱謂夾帶提攜、愛護、激勵、平等、互助等黨員關係，而爲男、女黨員一體所適用。蔡和森對向警予「同志式的論述」，避開「愛」、「慾」元素及其在黨員中所引起的紛亂爭執，爲日後中共革命史敘述的去性化、去情化，提供了重要源頭。

蔡和森書寫向警予，還迴避了中共聲稱提高婦女地位，實際上卻視女黨員爲「花瓶」、「點綴」的男權至上黨文化。向警予是共產黨內少數「資歷完整」的女黨員，她自己主持過一所女子學校，爲爭取經費，與地方縣長、督學打交道，並深入四鄉拜訪鄉人，宣傳女子入學的重要。當她與同儕一起到法國勤工儉學時，還能分身照顧其他女同學，領導婦女運動也夠熱心，書寫政論、女權評論都有獨到觀點，論能力、經歷應該不下於一般男性黨員。對於中共黨內女黨員被壓抑的處境，向警予並未留下直抒胸臆的文字。惟按照蔡和森的描述，向警予責任心重，好勝心也強。參加黨的工作後，認爲女同志能力不如男同志，就是一種奇恥大辱。同志們說她是女同志中最好的一個，她亦不能滿足。蔡和森在回憶向警予時稱：「她是黨的婦女工作的負責者；但她自己總是不甘於『婦女』的工作——縱然她在這種工作上得到一般的信任」；[44]「當然，從警予的能力來說，可以擔任一般黨的指導工作，這是從前黨的組織上的分配工作的缺點」。[45] 蔡和森的話語，點出共產黨內部權力分配與運作，實實在在存有

44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頁 5。

45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頁 5。

濃厚男女之別的偏見。婦女負責婦女工作，看似天經地義，卻隱含對女同志與婦女工作的輕視。蔡和森對於曾是妻子的向警予，最迫切想爭取黨內婦女地位的提升，顯然未予援手。蔡和森說出向警予的爭強好勝，更能反證中共的婦女地位提升、保障女權不過是種政治號召的門面。

蔡和森紀念向警予的文字，略過 1925 年向警予的其他事業表現，包括五卅運動前後，及其時兩人間情感的跌宕起伏，直接跳至 1925 年年底，兩人前赴莫斯科。關於向、蔡爲何在「大革命」形勢緊張之際，離開中國，如上所述種種內情，蔡和森有所避忌。他只說：「警予與和森對於愛情的觀點，最初都是最神秘的觀點，因此兩人之間反因此神秘的愛情而感受一種神秘的痛苦」。[46] 如此曖昧模糊說法，顯爲掩飾有損「烈士」形象的情感紛亂糾葛。蔡和森寫向警予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流露的是男性看待女性的「情」，不論感情、親情等，也清理得一絲不存，彷彿共產黨員都是鋼鐵鑄成的，沒有男女肉身，只有高貴靈魂。例如，莫斯科時期的向警予形象，簡直是到了肉體超脫的程度。他說：「向警予在莫斯科痛苦期間的學習有很大的進步，這是證明她的意志似鐵一般的堅強呀！每到她個人或同著和森最痛苦的時候，她每每回轉心腸咬緊牙齒，這樣地叫甚至這樣地寫道『只有爲革命死，決不爲愛情死』」。[47] 肉身既已超脫，情慾何來？這是革命烈士的原型，如此推理便證成了向警予有爲革命而死的準備。

向警予「赴義」，是蔡和森書寫向警予昇華成「完美烈

---

46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頁 5。

47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頁 5。

士」最重要的場景。事實上，1928 年 3 月至 5 月，蔡和森並不在武漢。他卻以極盡煽動的筆法描述向警予慷慨激昂赴義的細節，包括沿途向群眾高聲演說、大呼一切革命口號，群眾因而備受感動等等。最後蔡和森不忘加重筆觸，提到向警予被處死的日期，是 5 月 1 日。「五一勞動節」是社會主義革命歷史用來號召工人群眾所定出的勞動節紀念節日，它與向警予的死亡，被蔡和森移花接木地賦予中共在革命低潮的時代意義。蔡和森大聲疾呼道，向警予縱然肉身殞滅，但許許多多勞動群眾會接續完成「偉大無產階級女英雄」未竟的事業。蔡和森紀念向警予「同志」，終於揭開了其最終目的。原來向警予的死遠比她的生要來得更有號召力、更具宣傳效果，她的遭遇因死人已無法發言，因此而能被填塞與她有關、無關或些微有關的「革命」精神與內涵。典型就是蔡和森文末最後吶喊的：「武裝暴動建立工農兵蘇維埃啊！偉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沒有死，你永遠沒有死！你不是和森個人的愛人，你是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48] 似乎向警予在人世間的戚屬、友朋、同志都不再與她具有形體或社會聯結，已死的向警予昇華成爲當時、乃至後面數代黨員共有的「黨魂」。

四、1958 年大躍進與〈向警予同志傳略〉

1930 年代中共在城市的組織難以立足，軍事及政治轉入農村。在國民黨五次圍剿後，主力遷往西北的延安；經八年

48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頁 6。

抗戰、國共內戰終取得政權。此段歷史變化，中共職業革命家嶄露頭角，而 1920 年代創黨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部分由五四蛻變而來的黨員先驅，在政治上淪爲邊緣，幾乎都受冷落。惟以「向警予精神」在邊區中共中央組織及動員廣大婦女參加抗戰建國的工作指示下，又被拉出成爲婦女群眾的「導師」。

1939 年斯諾(Edger Snow)夫人寧謨・韋爾斯(Nym Wales)，[49] 這位女記者所寫的《續西行漫記》，其中有篇訪問蔡暢談蔡和森、向警予的專文，篇名爲〈革命的伴侶：蔡和森和向警予〉。該文出現的時間，正是中共極力鼓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宣傳抗戰到底政策的高潮。由於婦女被認爲佔人口半數，是抗戰不可或缺的力量，故而組織婦女投入抗戰工作，是 1939 年前後邊區婦女運動一度興起的原因，[50] 因之記者訪問蔡暢所寫出的向警予，便有著極強烈的動員婦女傾向，全文所突出的是婦女領袖不畏苦、不怕難的工作表現，如說向警予在鄉「領導五四運動」時，因熱心演講而身體受到摧殘，爲工作而完全忘了自己。[51] 蔡暢強調向警予本抱定獨身，她的哥哥蔡和森原也是堅定的獨身主義者，蔡、

---

49 寧謨・韋爾斯(Nym Wales)是 Helen Foster Snow 的筆名，她是斯諾(Edger Snow, 1905-1972)的太太，斯諾曾寫《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寧謨・韋爾斯(Nym Wales, 1907-1997)也是一名記者，同情中國革命，對 1930 年代有許多報導文字，著名的有《續西行漫記》（出版地、出版者不詳，復社藏版，1939)。

50 〈中共中央婦委關於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指示信〉（1939 年 3 月 3 日），收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頁 138-146。

51 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頁 296-297。

向在赴法航程中陷入戀愛，其結果令兩人都面臨拚命掙扎的困境，最終是有「聖人」之稱的蔡和森先下決心放棄獨身。[52]

蔡暢的說法，在日後所有回憶蔡、向關係的文字中幾乎未見，但若置於 1939 年戰爭中，邊區推動婦女工作的宣傳文本中，便可得到該說法的解答。當時中共中央提出要正視婦女家庭糾紛，須以家庭和睦原則引導婦女群眾轉向政治，婦運非爲女權保障是尚，而是一切服從於抗戰。[53] 故蔡暢當年談向警予，罔顧「哥哥、嫂嫂」別戀、受黨處置、乃至仳離的結局。[54] 她寫道，向警予從莫斯科回到武漢，「丈夫」在廣州，而向則是一位「非常重感情的人物，她非常熱愛丈夫和兒子」。[55] 蔡暢描繪向警予的種種工作表現，正呼應了同年毛澤東在延安慶祝三八婦女節發表的講話，對表揚向警予所寓意的重點，是在鼓舞抗戰中的婦女：「我們要培養幾千幾百的女英雄，幾百幾千婦女運動的職業家！」[56]

1928 年向警予死後直至 1940 年代，除了共產黨外，報刊公共言論未曾有表揚或書寫向警予這位女共產黨員的論述。可以說，這時期向警予被一般人徹底遺忘了。相對的，1950 年代後，每逢中共中央爆發政治權力爭鬥或進行社會動員時，「向警予」便被召魂，這顯示「向警予書寫」已成

52 甯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頁 296。

53 〈中共中央婦委關於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指示信〉（1939 年 3 月 3 日），頁 138-146。

54 蔡和森後和李一純在莫斯宣佈「結合」，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卷 1，頁 293。

55 甯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頁 300。

56 〈偉大的「三八」節日在延安〉，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扉頁插圖。

左派重要的革命論述資本。

1957 年年底，從蘇聯訪問回國的毛澤東，意氣風發地提出「超英趕美」口號，打算以群眾運動方式帶動經濟高速發展。在毛澤東的鼓吹下，短時間內，中國到處高舉三面紅旗。所謂三面紅旗，第一面是總路線，也就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第二面是大躍進；第三面是人民公社。[57] 毛澤東相信群眾可以被鼓動，主觀的意志可以提高生產、創造奇蹟，重點是各級黨幹部能否發揮影響力，以身作則，作爲群眾這列火車的發動機。大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瘋狂展開，同時共產黨內的宣傳及動員相應配合。向警予這位在三十年前殉難的烈士，再度成爲婦女工作部門配合國家政策所抬出來的「顯赫革命人物」。

大躍進的目標既是以群眾運動方式來展開經濟建設，主觀的人格與精神便被認爲是個人行動的最主要核心。向警予這位已死的女共產黨員，這一時期在紀念的同時，被賦予的形象與作爲就與 1928 年蔡和森的緬懷內容，乃至 1939 年蔡暢所描述的向警予有所不同。1958 年在婦聯主持下，中國婦女雜誌社編輯出版《烈士向警予》一書，於同年 12 月正式面世。[58] 寫在書扉最前面的〈出版者的話〉提到：「向警予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優秀女兒，她是人民解放事業、婦女解放事業最初和最得力的戰士之一。向警予同志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充滿革命樂觀精神，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59] 1958

5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頁 705。

58 李秋奇，〈三面紅旗〉，《檔案天地》，2013 年第 6 期（2013 年 6 月），頁 10-12。

59 中國婦女雜誌社編，《烈士向警予》（北京：中國婦女雜誌社，1958），

年婦聯發動紀念向警予烈士，與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息息相關。

在《烈士向警予》一書中，由中國婦女雜誌社編寫的〈向警予同志傳略〉，可謂是婦女部門統一口徑在特定的大躍進時代，「生產」出的「向警予烈士」。婦女工作部門的文字內容，不放在宣揚「女黨員」的貢獻與犧牲，對其一生的志業，描述平淡，一筆帶過。全文讀來，對向警予著墨最多的是提煉出她個人的人格與作風特質，也就是以身作則堪爲同志表率，以及不屈不撓、堅持前進的優秀黨員幹部。向警予究竟是什麼樣的女性？眞正於 1920 年代至 30 年代，和向警予接觸過的男女黨員，曾有提及，卻遠遠不如本篇紀念文章的具體可辨。

〈向警予同志傳略〉這篇紀念文字，一開頭就提到向警予青少年在校就學時，就是一個「勤儉、好學、淳樸、友愛」[60] 的好學生。從好學生起頭，此文之後描繪向警予形象固定，每每勇敢迎接時代的風雲變幻，既主動又積極，人格完美無瑕。舉例來說，在全國反袁世凱賣國和抵制日貨風起雲湧之時，她「領著同學四出宣傳，用慷慨激昂的演說，喚起群眾同心救國。她常常激憤得聲淚俱下，有一次她激憤得暈倒在台上，聽眾也激動得流下眼淚」。[61] 死去的向警予跨越時空來到 1958 年，被稱譽是自主能力強、工作投入、願意走向群眾，十足是現世的黨員模範。選擇性的挑選向警予生平，並加以渲染，成爲本篇紀念文的書寫主軸。向警予

扉頁。

60 〈向警予同志傳略〉，收入中國婦女雜誌社編，《烈士向警予》，頁 1。

61 〈向警予同志傳略〉，頁 1。

一生工作最突出的時期，莫過於是 1922 年到 1925 年領導中共中央婦女部。文章大加發揮，說向警予「深入各個工廠和勞動婦女群眾中，親自參加工人和婦女的各種會議，深入工人家庭，向他們解釋各種問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62] 向警予是少數女性得以進入中共權力高層，婦聯的筆鋒一轉，不強調婦女的努力何等不易，反而再次張揚投入工作的向警予，艱苦樸素，沒有知識分子架子，善於和群眾打成一片，更善於幫助在群眾中成長的幹部。稱她品德高超，「對人態度沈著和藹、誠懇親切，有誨人不倦的精神。爲了說服別人，她毫不吝惜時間，反復地講解論證」。[63]

1958 紀念文中的向警予既沒有發過牢騷，也沒有不滿中共對婦女工作的輕視，而是精神煥發、工作積極，盡心竭力做名好幹部。這篇紀念文的動機呼之欲出，充斥著對向警予生平不盡正確的敘述，只著意用她對黨的熱情貢獻，來激勵黨員追求同一精神境界。整篇紀念文章以「女」字旁的「她」來指稱向警予，這個「她」卻沒有性別提示。女同志不是向警予工作表現的思考點，向警予具有的黨員品格是男女黨員共同的標竿，是全體幹部的表率。這樣一來，「向警予同志」就昇華成爲無性別分野、超脫歷史時間空間、跨越政治派別爭議，永恆的「共產黨魂」。

1958 年婦聯紀念向警予，將向警予形塑成全體共產黨員效法的對象，並對於她的死亡，填充進更多英雄式的細節。例如，向警予慷慨激昂在法租界法庭上，昂頭挺胸，把法庭當講壇，宣傳她所進行的正義事業。此一書寫，令人起疑。

62 〈向警予同志傳略〉，頁 3。
63 〈向警予同志傳略〉，頁 3。

向警予的確在法國勤工儉學，但她的法文程度如何，卻不為外人所知。她是否能用法文盡情抒發她的理念，同時代人並未言及。這樣看來，婦聯的紀念文可能想像多過眞實。又，1928 年前後的報紙，並無關於法租界對向警予公開審判的紀錄。〈向警予同志傳略〉無意在史實的可信度取信於讀者，做為一個政治宣傳文本，更看重的是鼓動效力。該文對向警予隨著被捕、勇於陳詞後的處決一幕，做出更具戲劇性的描摹。描寫她被解送國民黨監獄，遭受到百般凌辱、嚴刑拷打，幾次死去活來，始終不泄露黨的秘密，因為她堅信無產階級鬥爭一定勝利。[64] 把「無產階級鬥爭勝利」轉化為「向警予同志」的信念，為「政治服務」的目的可說昭然若揭。1950 年代中國的新政權要強化社會主義統治權威，乃至凝聚黨員向心力，「向警予」寧死不屈，便成了社會主義「歷史傳承」與「革命延續」的最好例證。

1950 年代初掌政的中國共產黨才剛邁向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全新的意識型態、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黨內黨外懷疑聲浪四起。黨中央為去除質疑觀望心理，從武裝與堅定共產黨員精神入手，認為只有靠精神強固才能扭轉風尚。在此前提下，黨員的黨魂、黨格被提到前端。向警予的死在 1958 年的政治脈絡下，因此得到全新的解釋。向警予死時，共產黨幾乎奄奄一息，1958 年的婦聯卻宣稱，這些失敗預告共產黨的成功。同此脈絡，1950 年代，中共喊出的「階級鬥爭勝利」，這個在 1920 年代的中共黨內仍然無法想像，甚至無蹤無影的口號，竟然與向警予死亡連在一起。文章中說「千萬先烈的流血犧牲，換來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目前我國

64 〈向警予同志傳略〉，頁 4。

社會主義建設正在飛躍前進，我們今天紀念向警予同志，就是爲了學習向警予同志」。[65]「社會主義國家及建設」是在向警予死後，歷史推進將近 20 餘年後才在中國出現。後來產出的中共革命史敘述，卻偷渡著把中共鞏固政權、經濟建設各種企圖夾雜進入向警予的生平及死亡結局中。

1950 年代承續前輩黨員的「鮮血澆灌」，這樣的革命文宣，彰顯黨員血脈相連，在中共歷史中能夠產生極爲豐富的鼓動作用，這是「中共官方革命史」生產重要的環節。烈士與革命史的書寫，既懷有特定目的，因此從負責書寫的部門，到進入革命史行列的人物，甚至烈士作爲描述的重點，都流露特定時代、特殊政治號召的痕跡。向警予 33 歲的短暫生命，死得壯烈，尤爲革命文宣最易於發揮的典型。

五、1979 年打倒四人幫與〈緬懷向警予同志〉

1976 年，毛澤東在周恩來過世後，選擇華國鋒作爲未來政權的接班人。中共黨內因毛澤東病況日趨嚴重而埋伏著權力之爭，毛暗中支持的「文革派」江青、王洪文等人惶惶不安，不時挑戰華國鋒的地位。[66]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過世，最終，華國鋒選擇與老資望的軍系李先念、葉劍英合作，聯手打倒「四人幫」。1978 年 2 月，中共召開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會上華國鋒提出「團結起來，爲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而奮鬥」，提出農業、工業、國防、科學四個

65 〈向警予同志傳略〉，頁 5。

66 張根生，〈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武漢文史資料》，2008 年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4-9。

現代化。[67] 後毛澤東時代，中共黨內組成新的領導班底，沒有毛澤東的中共新政局於焉展開。事實上，華國鋒的領導並不穩固，他的聲望能力受到質疑。他試圖以「毛規華隨」的方式，承繼毛澤東的聲威，在修正文革的錯誤之餘，鞏固自身領導。

1978 年，在毛過世的震盪下，黨內外充滿對華國鋒掌權的觀望氣氛。這一年，是向警予 1928 年犧牲的 50 週年，4 月份一本標題爲《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的書刊問世。[68] 其中由婦聯負責人以及中共 1950 年代後的婦運要角蔡暢掛名書寫的〈緬懷向警予同志〉，是全書出版要旨說明的首要開篇文章。蔡暢與向警予不僅有姻親關係，且 1922 年，向警予回中國後，領導婦女運動，蔡暢當時在廣州也從事婦女運動。在中共女黨員群眾中，當時兩人黨齡與資歷，頗可相互媲美。1939 年蔡暢談向警予強調「近身觀察」，她稱向警予是「我的嫂嫂」，[69] 這個稱謂含有家庭情感意味。然而因文革打倒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破四舊」革命襲捲下，蔡暢收斂，甚至可說清除了與向警予的親屬關係及稱謂。1978 年蔡暢對向警予的回憶與紀念文字，明顯去除「私人感觸」或「戚屬親情」。和 1939 年相較，此時更強調向警予是完美「革命同志」。至於愛老公、兒子等這類足以勾動個人私念的說法因與時代不合，在 1978 年蔡暢寫向警予時，清理得一乾二淨，了無痕跡。華國鋒掌權下，蔡暢寫〈緬懷向警予同志〉，強調的是「革命同志」間

---

67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修訂版），頁 877。

68 《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69 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頁 295。

應有什麼樣的關係，以此做爲呈現「向警予」的主要論述要點。而這位「向警予同志」，與前面各個階段的「向警予」相較，不僅因政治需要被塗抹了生平，更因毛澤東的功過於 1978 年浮顯於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中，不得不藉由已死的向警予烈士來表揚「毛主席」的歷史貢獻。

蔡暢此文歪曲向警予的生平，比起 1958 年婦聯以及自己曾描述的「嫂嫂」的紀念文章，只能說有過之無不及。蔡暢說向警予在青年時期就跟隨「毛主席」幹革命，她無限崇敬「毛主席」、忠於「毛主席」，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即使向警予沒有留下任何自述的文字，但同時期人在 1920 年代的回憶與記錄，在在都說明向警予直到加入新民學會時，才認識毛澤東，而毛澤東當時只是一位十分熱衷於支持激進社會改革的反叛青年。向警予加入新民學會前後，是一位堅信教育救國的有志女青年。蔡暢說她是毛的學生、崇拜毛的「革命」，言過其實了。

事實上，毛澤東在蔡暢〈緬懷向警予同志〉一文中，反客爲主，成了眞正被表揚的革命主角。蔡暢說「向警予對『毛主席』遠大的革命理想，偉大的胸懷，淵博的學識，非凡的毅力，深爲敬佩，認爲有了『毛主席』，中國就有了希望」。[70] 在此脈絡下，蔡暢對 1920 年代的事件便做了乾坤大挪移。蔡暢說到 1919 年秋，毛在北京發起勤工儉學運動，向警予積極響應。然而，勤工儉學的發起者是蔡元培、李石曾，[71] 毛澤東當時還沒有知名度，更沒有與外國接觸的經

70 〈緬懷向警予同志〉，收入《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頁 1。

71 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北

驗，遑論發動勤工儉學。到了法國的向警予，也被蔡暢捏造出時常向毛報告學習、言行改變的「歷史情節」。向警予在法國確與在國內的毛澤東有書信往來，但那僅只是一般的交換心得與對時局的看法，「毛主席」並未佔據較高「指導」地位。向警予並非以前輩或導師的心態與毛澤東通信，更談不上「毛主席」覆信讚揚她這種革命精神，希望她繼續努力。蔡暢形容「警予同志就是這樣在『毛主席』的親切指引下，經過革命鬥爭的實踐，堅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72] 眞可謂是在一定政治氛圍下，順藤摸瓜的話語。

蔡文還不符史實地表示，1922 年向警予提出的指導婦女運動文件，許多是闡明毛澤東關於婦女運動的學說。實則許多資料顯示，毛澤東有關中國婦女地位的看法此時並不明確，一直要等到他開始投入農村暴動後，才對婦女政策有清晰的闡述。[73] 若要論在 1920 年代對婦女運動的看法與作法，向警予實比毛澤東有更早、更大的影響力。整體而言，蔡暢對向警予的描寫，諸多內容是爲映襯「毛主席」的偉大，凸顯「毛主席」在共產黨創黨之初即有重要貢獻。結論時，蔡暢直接就把向警予這位革命女烈士，轉化成爲 1978 年中共黨內風雲變幻、權力轉移、動盪不安時，用來忠告黨員要堅定立場的一位「忠貞先行者」。革命情操神聖高尚的向警予既然終生都受「毛主席」指導，「毛主席」的領導造就了如此完美的革命烈士，可見毛的崇高與偉大是有史可證、不

京出版社，1975）。

72 〈緬懷向警予同志〉，頁 2。

73 萬瓊華、宋楓霞，〈論毛澤東的婦女解放思想〉，《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報》，卷 14 期 1（2014 年 2 月），頁 7-9。

容置疑的。蔡暢利用向警予替毛澤東築起政治防護罩，有助於「毛主席」避開當時打倒「四人幫」的強大聲浪，以及對文革翻案呼籲的政治風暴。蔡暢的紀念文，最後強調華國鋒繼承的是「毛主席」，所以全黨理所當然要全力擁護「華主席」。蔡暢寫到：「我們一定要學習革命先烈的光輝榜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緊密地團結在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周圍，在黨的十一大路線指引下，進一步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爲實現華主席在五屆一大第一次會議上發出的向四個現代化進軍，建設建大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號召，繼續長征，奪取新的勝利」。[74]

2005 年，適逢向警予誕辰 110 周年，中共黨內走出文革風暴，經濟發展延續鄧小平改革開放，以穩健持平方式邁步向前。中國共產黨及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於 2002 年 11 月，黨的十六屆大會中，提出「三個代表」口號。意指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75] 三個代表首先揭櫫「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共把生產力提升的關鍵放在工人階級，而非農民階級。想方設法使勞動力轉變成先進的生產力，頓時成爲黨內上上下下全力以赴的任務。

2005 年出版的《向警予紀念文集》，[76] 在編輯的卷首

---

74 〈緬懷向警予同志〉，頁 5。

75 陳錫喜，《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

76 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語中提到：「我們提到向警予同志，就是要學習她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群策群力的群眾精神、親力親爲的務實精神，努力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永遠保持共產黨人的先進性」。[77] 與以往不同的是，當年這本新出版的向警予文集，其編輯工作由中央下交地方黨務組織，掛名承擔編務的有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以及中共懷化市委。地方黨務體系有權介入革命烈士的書寫，顯示革命烈士人物的闡述稍有鬆動。但這些「鬆動」又非全面解禁，寫什麼、怎麼寫仍須由黨務系統把關。

2005 年這本《向警予紀念文集》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已故美國中共婦女史學者柯臨清(Christina K. Gilmartin)在書末撰寫了一篇〈西方學者對向警予的研究〉。[78] 內容提到向警予的研究一直以來受限於資料沒有全面公布，導致美國學者要解釋向警予的女權思想與她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中的影響時，往往流於以偏概全。不夠充分的資料，使得研究不得不摻雜推測的成份。西方學者Andrea McElderry，1984 年曾寫了〈女革命家：向警予〉(“Woman Revolutionary: Xiang Jingyu”)一文，[79] 與柯臨清所說不謀而合。該文的主要資料是 1980 年出版的《向警予文集》，文集所收向警予文章不夠完整；同時，其他和向警予接近的同時代人的文集亦尚未大批問世，參考佐證的資料頗嫌不足。惟西方學者的向警予

---

77 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頁 3。

78 〈西方學者對向警予的研究〉，收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頁 394-396。

79 Andrea McElderry, “Woman Revolutionary: Xiang Jingyu,” *The China Quarterly* 105 (March 1986), pp. 95-122.

研究，在有限制的資料下，討論焦點多放在近代中國女權與婦女地位變化這個主軸上，對於向警予的女性意識著墨較多，而此恰恰正是中共書寫向警予，淡化最多之處。

自向警予於 1928 年「殉革命而死」後，到二十世紀最末 10 年，中共不斷地在政治變動或革命高潮、低潮時，將向警予的生平予以或多或少的改寫，這成了中共革命史書寫慣用的手法。胡適曾言，歷史像是個小姑娘，免不了被支配、被打扮，而中共革命烈士傳記、形象的塗抹，尤爲顯著。對後代史學家來說，觀察某些歷史人物進入中共革命史書寫與釐清中共革命史的來龍去脈，變得同樣重要。所以，革命書寫向警予，儘管各階段有不同表述，但也有趨同之處。即是，婦女在黨中的權力分配、工作限制與婦女運動在黨內的邊緣化，乃至男女黨員違反黨紀涉及的私情問題，在各個時代的「烈士」書寫中，全都被清洗掉。而向警予的「紀念書寫」，既然不強調「女」烈士的性別處境，即可以用來代表其他中共革命烈士。無論男女，一旦進了革命史的行列，他們的眞實面貌便免不了在政治塗抹下扭曲、變形。也可以說，烈士一旦上昇成了「革命樣板」，在群眾教育與政治宣傳反覆沖刷後，「女性向警予」的眞正樣貌，無可避免地被肢解、拚湊得難以辨認了。

六、結論：向警予與「湘女」精神

「美哉！盧峰之下溆水濱，我校巍巍矗立當其前。看，我們姊妹一堂，相愛相親。現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

觸目驚心！願同學作好準備，為我女界呵，大放光明」。[80] 這首校歌歌詞是時任溆浦女校校長的向警予所作，時間是 1917 年。當時，她是一個未曾駐足近代中國新教育匯聚、思想日新月異的北京、上海大城，而是僻居內地省份的有志女青年。也就是說，她身處風氣封閉又落後的湖南溆浦，未進過眞正一流學府、未曾接觸過高深學理、思想，卻產生具開創窮鄉僻壤新風氣大志，又能極力鼓吹男女平等的胸襟，顯見她確實卓然不凡。2011 年，戴緒恭、姚維斗兩人編的《向警予文集》問世，收錄了溆浦女校校歌。校歌文字以及其他「抒志」、「言感」之作，揭開向警予去政治化後的生命軌跡，刻劃出向警予長久以來在政治塑造中，被削弱掩蓋的「女性」眞面目。

2015 年，向警予逝世 120 周年，湖南《湘潮》出版專刊，各方面專家、學者寫了一系列推崇向警予的文章。其中有一個是過去研究中較少被提及的重點，那就是向警予的「湖南文化」背景。這些文字發揚湖南從屈原以來所蘊育的湖湘文化中的愛國憂民情懷，揭舉近代曾國藩、毛澤東等一系列湖南籍「偉人」系譜，向警予也成為此系譜中重要一員。這種書寫角度著重於 1911 年至 1919 年，向警予在湖南接受教育繼而辦教育的歷程。這樣的追溯，褪除了長久以來強調的毛澤東、蔡和森乃至新民學會「男性」的影響，轉而強調湖南人文、地理環境培育形塑了「女性」向警予，這是過去研究中未曾發抒的角度。只是這種書寫雖然突出向警予的

80 〈溆浦縣立女校校歌〉（1917 年），收入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頁 313。

「湘女」身分，卻又不免連結地域政治的婦女工作色彩。[81] 不過，女性意識注入向警予研究，畢竟是個新的研究起點。本文對向警予研究的論述，雖無法全面觀照女性觀點，惟可以確定的是，向警予資料已比過去開放更多，新資料理應可澄清許多過去理不清、說不明的疑點。矛盾的是，政治動員態勢雖已減弱，相對的向警予研究也趨於式微。此種「政治」與「性別」互相提升，又彼此掩蓋的歷史研究軌跡，正提供了近代中國婦女運動，甚至是女權歷史發展中的一條隱伏線索。更明確地說，婦女聲音如何與「婦女史」書寫的歷史，構成對話，而研究者又如何在對話的縫隙中，重新建立婦女自身及婦女在歷史中的真面目，頗值得體會、玩味。

---

81 胡馨月，〈向警予與湘女精神〉，文末提到 2014 年 12 月，省委書記徐守盛在全省二次婦女代表大會上說：「希望全省廣大婦女把握機遇、胸懷大局，進一步激揚巾幗之志、凝聚巾幗之力、彰顯巾幗之美，在奮力譜寫中國夢的湖南篇章中創造優異業績、書寫精彩人生」。胡馨月，〈向警予與湘女精神〉，《湘潮》，期 10（2015 年 10 月），頁 142。

徵引書目

一、報刊

《延安日報》（延安），1939。

二、專書

《紀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義五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編，《鄧穎超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共上海黨史大事記(1919-1949)》。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

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懷化市委編，《向警予紀念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黨史研究室編，《中國人民永遠記著他──蔡和森 110 周年誕辰紀念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中國婦女雜誌社編，《烈士向警予》。北京：中國婦女雜誌社，1958。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人物誌》，集 3。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革命文獻》，集 1。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3。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侯鳳雲，《傳統、機遇與變遷——南京現代城市現代化研究(1912-1937)》。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柯惠鈴，《她來了——後五四新文化女權觀，激越時代的婦女與革命，1920-1930》。臺北：商務印書館，2018。

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室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7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郭華倫，《中共黨史》，冊 1。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東亞研究所，198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陳錫喜，《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

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寧謨・韋爾斯(Nym Wales)，《續西行漫記》。出版地、出版者不詳，復社藏版，1939。

鄭超麟，《史事與回憶——鄭超麟晚年文選》，卷 1。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3。

戴緒恭，《向警予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長沙：新華書店，1985。

戴緒恭、姚維斗編，《向警予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羅時暘編著，《秋瑾》。重慶：青年出版社，1945。

蘇平，《蔡暢傳》。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

Gilmartin, Christina K.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三、論文

何先培，〈眞情透紙背——品讀向警予家書十封〉，《湘潮》，期 10，2015 年 10 月，頁 106-108。

李秋奇，〈三面紅旗〉，《檔案天地》，2013 年第 6 期，2013 年 6 月，頁 10-12。

胡馨月，〈向警予與湘女精神〉，《湘潮》，期 10，2015 年 10 月，頁 139-142。

胡纓(Ying Hu)著，龍瑜宬譯，〈九葬秋瑾——歷史紀念與公共記憶的製造〉，收入鄧小南、王政、游鑑明主編，《中國婦女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張根生，〈華國鋒談粉碎四人幫〉，《武漢文史資料》，2008 年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4-9。

萬瓊華、宋楓霞，〈論毛澤東的婦女解放思想〉，《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報》，卷 14 期 1，2014 年 2 月，頁 7-9。

McElderry, Andrea. “Woman Revolutionary: Xiang Jingyu,” *The China Quarterly* 105, March 1986, pp. 95-122.

"Martyr Xiang Jingyu": Revolutionary Writing and Construction of May Fourth Radical Wome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uei-ling Ke*

Abstract

Xiang Jingyu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women party members in the entir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e was born in 1895 and died in 1928 when the "Great Revolution" was nearly destroyed and the CCP was falling apart. Xiang was caught by the police when a party traitor informed the French authorities. She was then transferred to the local warlord, Hu Zongduo, who ordered her execution. Xiang had joined the CCP in 1922 at the age of 27, and she was 33 years old at her death, giving her only six years in the CCP. Starting immediately with her martyrdom in 1928, the CCP began to produce her life story, the first biographical essay written by her husband, Cai Hesen. In 1939, Mao Zedong declared Xiang to be a woman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labor model in order to mobilize the women of the border regions. When the CCP began the Three Red Flag political economy mass mobilization in 1958, the Women's Federation called for ardent action to commemorate Xiang. Unti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in 1978 and the Gang of Four collaps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consistently rewrote Xiang Jingyu's life to cultivate loyalty to party. In 1990, Xiang's commemorative writings were given to the Hunan Provincial party. On the 120th anniversary of Xiang's birth in 2015, a Hunan journal published a commemorative issue that tried to connect the two concepts of writing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of constructing martyrs so as to deconstruct Xiang's martyrdom.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reflected shifts in writings of Xiang's life, revealing how political mass movements have operatedsince the 1920s.

Key Words: Xiang Jingyu, May Fourth, women, revolutionary martyr, history writing